

##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sup>(\*)</sup>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回顾与前瞻

○ 段文斌<sup>1</sup>, 张文<sup>1</sup>, 刘大勇<sup>2</sup>

(1.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2.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天津 300072)

(摘 要)通过发挥自身的组合优势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经济实现了 30 年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本轮全球化中形成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体系和中美经济的互补性难以持续,我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依靠凯恩斯主义来维系,同时新动能正在孕育并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和加快投资,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消费的扩大和升级与技术的创新和渗透应当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就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传统服务业而言,既存在实体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也存在虚拟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产业升级与金融深化的双重任务需要在良性互动中协调并进。作为政府主导型特征鲜明的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须依托于政府转型,既要培育新动力又要减少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新“中心—外围”;产业升级;金融深化;制度性交易成本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8.04.004

###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1949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78 年,主要是推行“斯大林模式”构建起计划经济体制,再一次启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sup>(1)</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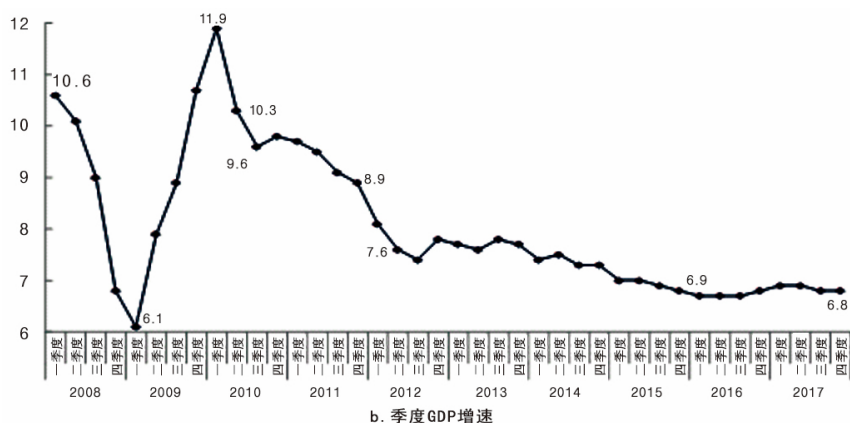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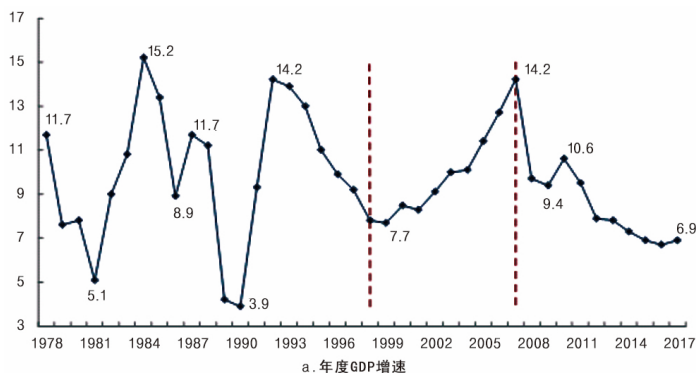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段文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伯苓学院副院长,天津市 131 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张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大勇,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研究工作得到天津市 131 创新型人才工程资助。

在生产水平低下或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时,计划经济是非常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然而,计划经济具有不可持续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需求越表现出范围广、多样化、多层次特征,计划经济就越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并非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调节机制,发展“体制外经济”,因此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模式”。双轨模式使我国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在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了经济起飞(见图1a)。同时,双轨模式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例如“两个毫不动摇”、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也出现了改革以来的首次通货紧缩,这是一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根本性标志,有效需求由此也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内需不足的必然结果就是扩大外需,因此商品输出浪潮成为了我国改革以来的第一轮“群众运动”。从通货紧缩到商品输出,并非我国独有的特点,而是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

图1 1978-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http://www.customs.gov.cn>。

1998—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是通过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来应对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凯恩斯模式”,并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见图1a)。从其间的1999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并由1999年的263亿美元持续快速地扩大到2011年的4961亿美元(见附表1)。这在国内市场造成流动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而在国际市场则造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双顺差是人民币“内贬”与“外升”的同一根源,而“内贬—外升”的必然结果就是人民币和人民币资本输出。因此,资本输出浪潮成为了我国改革以来的新一轮“群众运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为应对危机依然采用凯恩斯模式。这对于调节经济周期性波动或许是有效的,可以短期对冲“硬着陆”的风险,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然而,老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矛盾,凯恩斯主义难以破解我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中所累积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发展难题,进入“新常态”实乃必然(见图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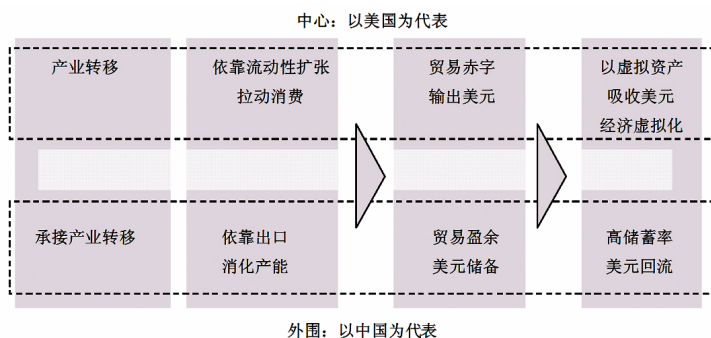
## 二、高速增长的缘由及其不可持续性

### (一) 新“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有两重涵义——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突出意义在于,使人口由不流动转为流动。这不仅为工业化贡献了“人口红利”,更重要的是使我国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和能源)、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规模大且快速成长的市场等潜在优势,积聚形成了现实的组合优势。<sup>(2)</sup>同时,对外开放使我国的组合优势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产业转移相契合,引进了资本、技术和营销网络,并通过FDI(对外直接投资)融入全球生产体系,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和出口大国,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发展中赢家”。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高速增长,就是通过发挥组合优势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实现的。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在新“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展开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于“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居于“外围”(见图2)。

图2 “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格局



1. 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链整合,将产业链中的低端部分转移到“外围国家”;我国凭借自身的组合优势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如此,随着“外围国家”学习能力的增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也逐步升级,即由低端走向中高端。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越来越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线越来越长,而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线越来越短。

2. 美国依靠流动性扩张刺激消费;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依靠出口消化产能。美国通过贸易赤字获得商品,同时输出美元;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成为美元的吸纳地。该循环的实质是发达国家用高端产品同发展中国家交换中低端产品,同时通过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货币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从这种交换中获取福利。

3. 高储蓄率的贸易顺差国(特别是我国),需要将外汇储备转换为美元资产,从而美元回流;美国依靠虚拟资产吸收境外美元,从而经济虚拟化,并进一步支撑了其流动性扩张。

可见,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相互间形成了很强的互补性和路径依赖。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向外输出美元,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不断扩大的国内储蓄与投资间的缺口,是其私人 and 政府低储蓄和透支未来的结果。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美国,实质上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美国则是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来维持投资和消费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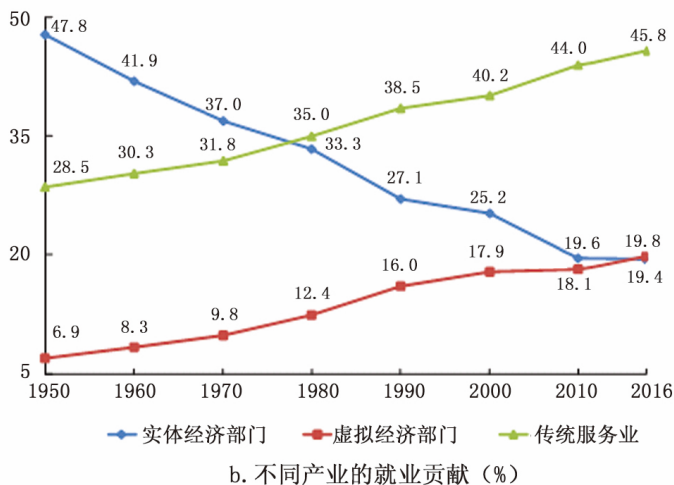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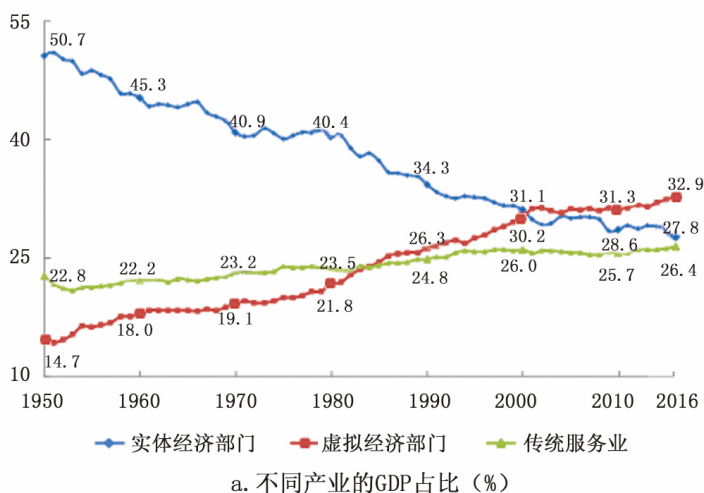
“主导”与“挤压”是理解新“中心—外围”的关键。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格局和经济增长模式,“外围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卖到哪里去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心国家”主导的。另一方面,“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形成挤压,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链须向高端延伸或培育出新兴产业。然而,即使信息技术革命都难以让美国用高端产品足以交换所需的中低端产品。因此,必然依靠虚拟资产吸收境外美元,从而导致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失衡。<sup>(3)</sup>

## (二) 发达经济体:从经济虚拟化到再工业化

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经济开始发生转型。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两个根本性变化,由此走上了新式发展道路,并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其一,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成为其发展模式的鲜明特征<sup>(4)</sup>。1980—2016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0%降为28%(其中的制造业由20.5%降为11.7%),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虚拟经济部门增加值的比重则由22%升至33%<sup>(5)</sup>(见图3a)。其二,美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3年以来,经常项目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项目由逆差转为顺差(见附表2)。前者意味着美国由“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净消费者”,后者意味着境外美元资产膨胀。可

见,“去工业化”、经济虚拟化与贸易失衡、境外美元资产膨胀,是美国经济转型的统一过程。

图3 1950-2016年美国不同产业的GDP占比和就业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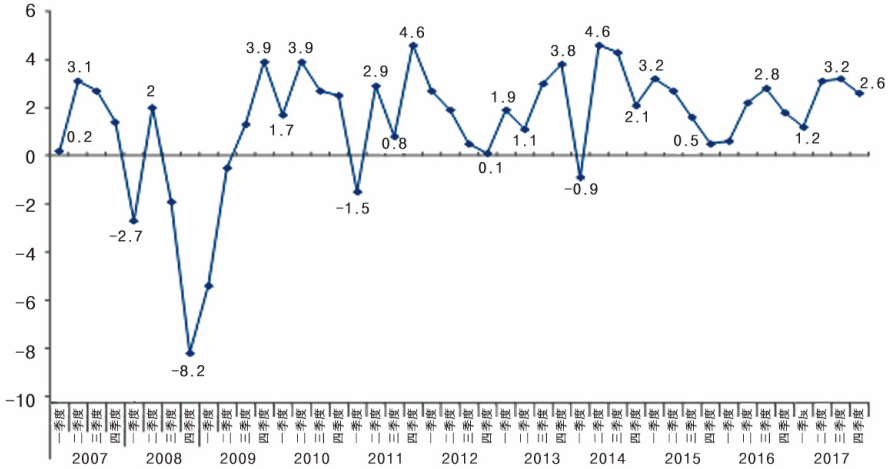
说明: 就业人数是指该行业全职工作人员(Full-time equivalent employees)与兼职工作人员(Part-time equivalent employees)的总和。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商务部(<http://www.bea.gov/index.htm>)和美国劳工部([http://www.bls.gov/schedule/archives/empsit\\_nr.htm](http://www.bls.gov/schedule/archives/empsit_nr.htm))相关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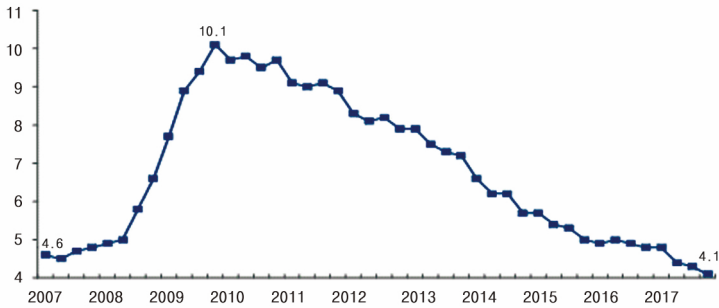
美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已经大体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见图4),但就业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就业数量的增加与就业质量的下降同时并存。2005—2015年,94%的新增就业岗位属于“替代性就业岗位”,即所谓的零工、散工和短工,缺乏稳定性、收入不固定,且缺乏福利保障<sup>(6)</sup>。其症结就在于,与美国“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相伴随的,是“就业创造”与“GDP创造”的背离。从GDP创造的均值来看,依次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和传统服务业,虚拟经济的

GDP 创造能力明显高于实体经济和传统服务业。进一步,对比不同部门的 GDP 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可以发现:(1) 虚拟经济的 GDP 贡献率高,而就业贡献率低;(2) 传统服务业的 GDP 贡献率低,而就业贡献率高;(3) 实体经济的 GDP 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大体相当。然而,“去工业化”已大大削弱了美国实体经济的 GDP 创造能力(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而其就业创造能力随之大幅降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的智能化、数字化使其就业创造能力进一步下降(见图 3)。

图 4 2007 - 2017 年美国经济增长和失业



a. 经济增长率 (%)



b. 失业率 (%)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劳工部(<http://www.bls.gov>) 和美国商务部(<http://www.bea.gov>) 相关数据整理。

美国经济虽然逐渐走出衰退并实现复苏,但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若要增加就业,则须扩大对传统服务业和实体经济的投资,然而与虚拟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相比,它们并不具有吸引力。对于虚拟经济主导下的美国经济,“奥肯定律”已然失效,凯恩斯主义适用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工业化时期的大危机,但难以解释当代的“低就业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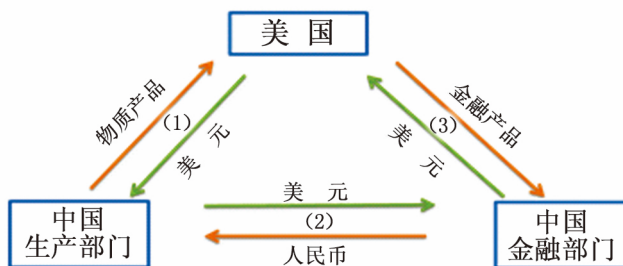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实现“再平衡”，必然转向发展实体经济和缩减财政赤字。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更加注重用科技引领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发达国家缩减财政赤字，居民改变消费模式，将会使市场需求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之一<sup>(7)</sup>。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不过是这一长期趋势的极端表现，并非一时的短期现象。因此，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不得不面对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增长模式再一次深刻变化所产生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 (三)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为什么说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并逐渐强化的中美经济互补性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双方都在进行深度调整；另一方面，支撑我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依靠凯恩斯主义来维系，同时新动能正在孕育并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

1. 流动性膨胀与过剩。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可以简化为图5所示的循环，其实质就是我国以物质产品交换美国的金融产品。我国生产部门向美国出口多少物质产品（图5中的关系1），我国的金融部门就要投放相应价值的人民币（图5中的关系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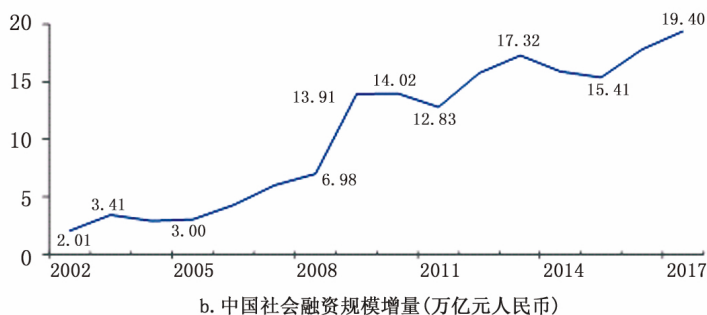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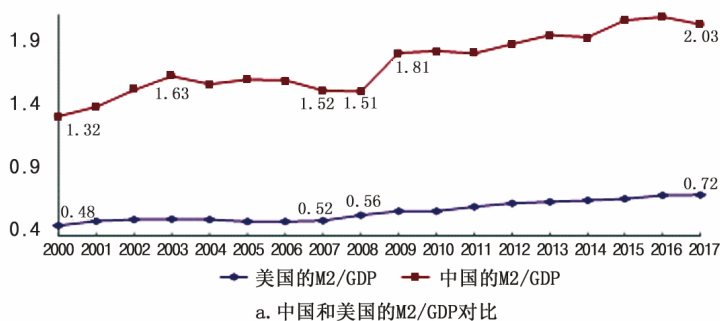
图5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家庭所面对的失业、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难以完全释放。因此，更倾向于把收入转化为储蓄而非消费，高储蓄率一直延续。持续30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资本的净流入必然造成“双顺差”，进而我国经济不得不应对国内的流动性膨胀。2008年前我国M2与GDP的比值在1.5左右，2008年后升至2.0以上；2008年前社会融资规模每年增长不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后升至19.4万亿元人民币（见图6）。过剩的流动性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出口，这具体表现为更多地流入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国有大中型企业，而非居民消费和民营中小企业。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其直接原因就是流动性的膨胀与过剩。“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一降”（降成本）、“一补”（补短板），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关口。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上述循环中中美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不利于中国的债

图6 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国人民银行 (<http://www.pbc.gov.cn>), 美国商务部 (<http://www.bea.gov>)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

权债务关系(图5中关系3), 其中的症结就在于美国利用利差和期限清偿其国际债务的方式。简单假定我国购买10万美元美国债券的利率为5%, 美国将这10万美元以FDI形式投资于我国, 回报率为20%, 这样就形成了15%的利差。10年后, 美国可以凭借利差将本金和利息全部还清<sup>(8)</sup>。美国即使采取“借短投长”, 以短期借款做长期投资的危险操作, 都不一定会引发债务风险。原因就在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和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价格。假定我国借出10万美元时的汇率为1美元兑10元人民币, 10万美元就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当美国按期归还10万美元时, 汇率变为1美元兑5元人民币(人民币对外升值), 10万美元就只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了。

不仅如此, 如果美国国内价格稳定, 则持有10万美元并不贬值, 其购买力并不降低。若我国国内价格(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 人民币对内贬值, 则当初借出的10万美元(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不仅变为了50万元人民币, 而且其购买力还将进一步下降。例如, 当初房价为5000元/平方米, 100万元人民币可以购买200平方米的房子。美国按期偿还欠债时, 国内房价涨到50000元/平方米, 此时50万元人民币只能购买10平方米的房子了。上述故事并非虚构, 而是在30年中美经济循环(如图5所示)中真实地发生了。因此, 我国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将美国到期归还的10万美元继续购买美国债券, 而不是兑换成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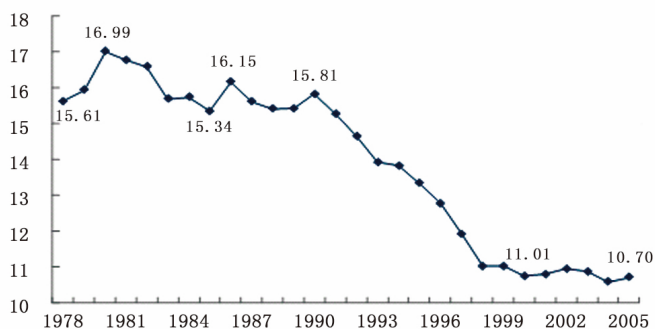


总之,利差和期限的客观存在,使美国的国际债务清偿实际上变成了不受任何道义谴责的“逃债”。<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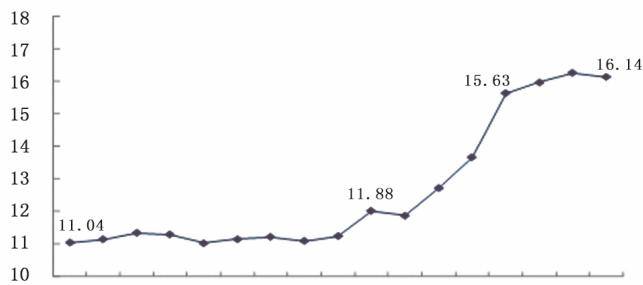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我国应当(1)扩大进口,减少顺差,追求进出口平衡增长<sup>(10)</sup>; (2)减少美元债权或把美元债权转换为人民币债权,其含义是减持美国国债,同时向海外输出人民币(如发放人民币贷款); (3)减少人民币债务或把人民币债务转换为美元债务,其含义是摒弃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同时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要义就在于突破了“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不可持续的中美经济循环,进而形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的循环,经济全球化格局已经悄然变化,其影响必将是深远的。

2. 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生产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和要素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变量。2008年以来,这些生产要素的实际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口结构转变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难以逆转;政府主导下的超常规投资已经难以为继;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已经倒逼更大力度的节能环保和生态治理。

图7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



a. 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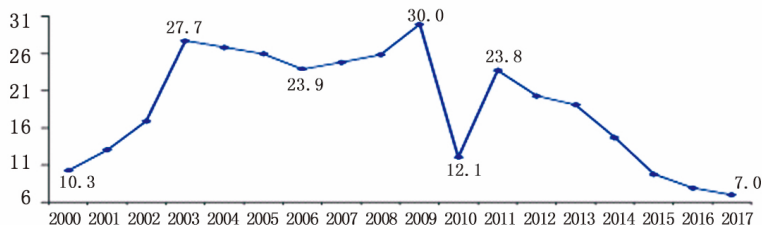
b. 城镇单位人员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

说明:从2006年职工工资总额不再进行统计,代之以城镇单位人员工资总额(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GDP为2016年修正后的数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012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升转降,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使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整体上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为趋势(见图 7)。资本形成既要看投资总量的增速下降(见图 8),更要看投资结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是我国投资的“三驾马车”,其特点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牵引,制造业投资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因地方债风险,其空间逐步收缩,房地产投资的历史峰值期已过,因此制造业投资下滑。总之,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已经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转向提高生产率、以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为了必然选择。

图 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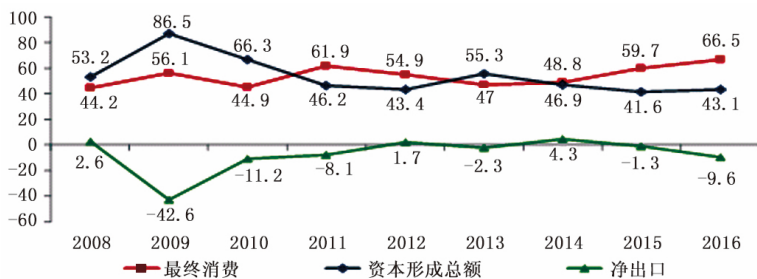


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未扣除价格影响因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www.customs.gov.cn>。

2008 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结构可以从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三个维度来描述。从收入结构看,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企业利润占比下降。劳动收入影响消费,企业利润影响投资,因此支出结构就表现为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上升,投资的贡献下降。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超过资本形成的趋势已经形成,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2/3 (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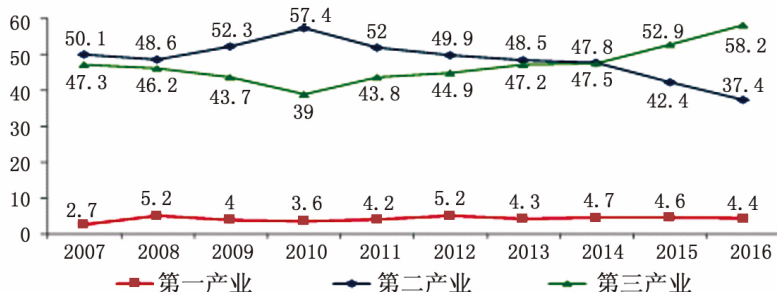
图 9 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逐步升级;而随着消费升级,生产结构已然变化。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2015 年后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超过 50% (见图 10)。总之,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是内在联系的,是历经 30 年高速增长后出现的积极变化。而这一系列变化主要源于人口结构这个“慢变量”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sup>(11)</sup>。

图 10 三次产业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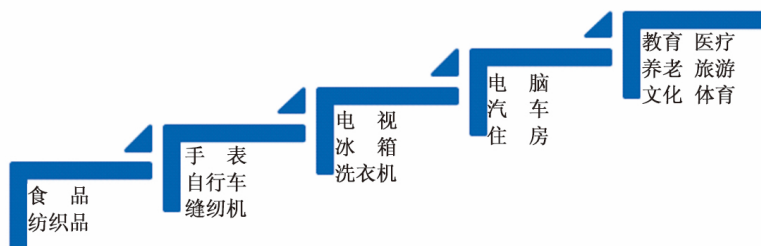
### 三、新阶段下的发展模式转型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经济虚拟化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无论是用更多流动性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还是用更大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都是基于经济周期波动,而非经济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和加快投资,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sup>(12)</sup>。

#### (一) 扩大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需求是产业成长的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间,我国的消费结构依次经历了三轮升级过程。1980 年代,由衣(纺织品)食(食品)到所谓“老三样”(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1990 年代,再到所谓“新三样”(彩电、冰箱和洗衣机);2000 年以后,进一步到汽车、住房等。与此相应,主导产业也经历了由轻纺工业到新一代家电产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再到汽车、住宅、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等先导性产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中间投入品行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行业的升级过程。在我国 30 年高速增长中,实际上形成了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而消费升级驱动产业升级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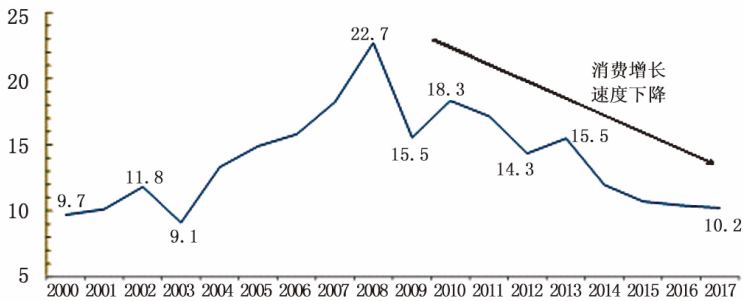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的消费升级



我国须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持续成长。近 10 年来,我国出现了第四轮消费升级,即对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日益增长。同时 2017 年底

我国在现行标准下仍有 3046 万贫困人口,尚未登上第一个台阶,因此在不同的消费梯度上都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和现实需求,关键是如何满足——扩大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然而 2008 年以来消费增速由 22.7% 降至 10.2% (见图 12)。为此,需要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让中小投资者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保障住有所居的住房制度<sup>(13)</sup>。总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在新发展阶段须坚持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共建共享。同时,这也是以消费扩大和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和持续成长,进而增强发展动力的必然要求。

图 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 (二) 内生技术能力与要素生产效率

在新发展阶段,以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须依托于内生技术能力。30 年高速增长期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产业间资源再配置。虽然这已经衰减,但“效率洼地”在新发展阶段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产业内的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明显。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着力点须转换。

1996—2015 年,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世界平均水平为 1.3%,美国为 1.6%,我国达到 8.6%。然而,即使如此快速地追赶,2015 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仅为 7318 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 18487 美元,美国达到 98990 美元。可见,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很大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4% 左右,也是居于世界前列。在年均 9%—10% 的 GDP 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40% 左右。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1%—2%,但对其 GDP 增长的贡献已达 80%—90%。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比之前二三十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 1 个百分点以上,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迹象<sup>(14)</sup>。因此,在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其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已经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义<sup>(15)</sup>。

内生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是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扩大循环累积的结果<sup>(16)</sup>。随着30年高速增长,我国已拥有的制造业基础和基于加工组装能力的市场规模,使其逐步具备了实现自主创新的基本条件。目前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关系。企业及其组织能力是技术创新的载体,我国的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中小企业成为了技术创新的主体<sup>(17)</sup>。实际上其含义完全不同,发达国家表现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其背后隐藏着大公司的影子,钱德勒式的技术创新并没有过时,不过是在新时代取得了新的形式罢了,由大公司主导技术创新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开放准入和公平竞争,在市场竞争中生成有竞争力的大公司,是我国形成内生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的深化——致力于反垄断和竞争性市场建设,致力于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组织。同时,处理好技术创新与技术渗透的关系。技术创新只有有效地渗透到生产和交换流程之中,才能促使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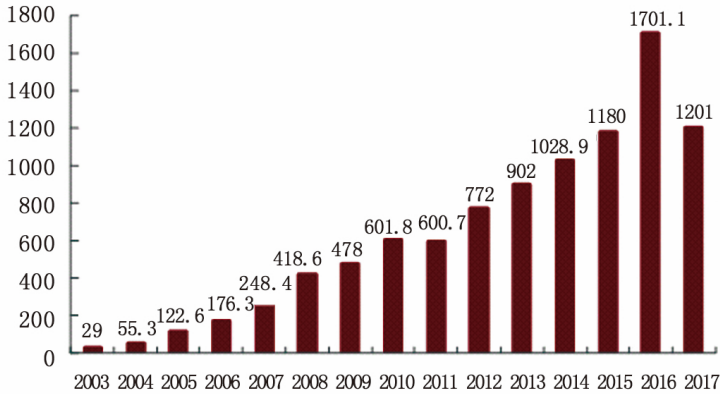
### (三) 资本输出、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深化

欧元的出现已使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为美元—欧元“双本位”体系<sup>(18)</sup>,而它又是缺乏稳定性的货币体系。如果美元超发行或贬值,欧元势必跟进,否则欧元升值。这一方面将抑制欧元区出口,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将导致国际资本涌入进行投机套利,进而加剧欧元和欧元资产价格波动。反之亦然,如果欧元超发行或贬值,美元也势必跟进。两种本位货币轮番增发,世界因此从未像今天这样流动性膨胀。“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债务危机可能成为欧美经济实现“再平衡”之前的一种常态。

“中心国家”发展虚拟经济和债务经济,“外围国家”发展实体经济、输出商品和提供融资的国际分工格局,不可能造就一个和谐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只能通过拥有强大实体经济的第三方的加入,以避免“双本位”体系下的“滥币陷阱”<sup>(19)</sup>。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三足鼎立”的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

1999—2011年,我国持续的“双顺差”(见附表1)带来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见图13)。这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和60年代后的德国,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本币和本币资本,以对冲经常项目顺差。同时,这也像当年的英美一样,通过资本国际化,实现用世界的资源支撑本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当前,我国的资本输出实质上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起点,而且是一个重要支点。反过来,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资本输出和全球配置资源。进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拥有强大实体经济的第三方融入当前缺乏稳定性的双本位货币体系,使之演变为相对稳定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这可以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双重意义。

图 13 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意味着人民币“走出去”,走出去的人民币只有“回得来”,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回得来不仅是指人民币持有者可以购买我国的商品和劳务,而且是指可以投资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后者正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瓶颈,这就要求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最为基础的是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sup>(20)</sup>。应当指出的是,金融深化须围绕本国实体经济的需要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一方面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总之,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既存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而不断强的问题,也存在着虚拟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问题,产业升级与金融深化的双重任务需要在良性互动中协调并进。内生消费需求的拉动和内生技术能力的推动,应当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资本输出与人民币国际化互为表里,将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而这又需要国内金融市场深化的支撑。

#### (四)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政府转型

对于新阶段的我国经济发展而言,作为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传统服务业三者不可偏废。首先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透过国际金融危机可以更清醒地认识高科技和现代金融的本质,高科技只能来源于生产过程,即使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也不能脱离生产过程。不仅如此,高科技只有与生产过程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创造价值,才有真实意义。仅靠所谓高科技概念虽能创造货币财富和GDP,但实际上创造的只能是价值符号和泡沫。金融从本源上就是由生产和流通派生而来,世界金融中心在历史上都曾充当世界工厂或贸易中心。人们一度撇开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现代金融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通过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发展起来。本轮危机再一次揭示出,失去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高科技和现代金融就失去了根基,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同时不能忽视就业压力的长期存在。

传统服务业作为解决就业压力的主渠道作用将日益凸显,但其就业创造与价值创造是背离的。欧美经济失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从本质上反映了富人经济与大众经济的矛盾和冲突。就资本而言,高利润、高价值和高端化的新兴产业永远是追逐的目标,从微观角度看这并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对于国民经济则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就业乃民生之本,就业永远比GDP更为重要。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极端民族主义、经济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富人经济与大众经济的博弈。资本忽视以所谓“低端”“低价值”和“大众参与”为特征的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但政府始终要用政策来维系,推动以新技术改造而不是放弃传统产业和促进传统服务业发展<sup>(21)</sup>。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别需要警惕两个陷阱。一是收入陷阱,即收入福利水平过快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脱节,这最终将形成债务危机。因此,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根本上避免形成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服务业陷阱,即在进入高收入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之前,制造业过早退出主战场而让位于服务业,使制造业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因此,处理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金融和虚拟经济,以及传统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对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作为政府主导型特征鲜明的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须依托于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既要培育新动力又要减少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会促进新动力的生成。总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政府作用,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放手”不是“甩手”。<sup>(22)</sup>

注:由段文斌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南开大学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团队,曾对改革开放30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发展转型,进行过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形成的成果包括段文斌、张曦《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来自中国的经验》,《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段文斌、刘舒潇《全球性衰退中的中国经济:反思与前瞻》,《理论前沿》2009年第8期;南开大学产业经济课题组《后危机时期中国产业的成长方式和路径转型》,《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段文斌《产业升级与金融深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7日第6版;南开大学产业经济课题组《新国际产业转移、新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发展转型》,《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等。本文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完成的,希望能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南开大学胡秋阳教授参与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附表 1 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	经常账户	非储备性质 金融账户	外汇储备	年份	经常账户	非储备性质 金融账户	外汇储备
1982	57	-17	69.86	2000	204	20	1655.74
1983	42	-14	89.01	2001	174	348	2121.65
1984	20	-38	82.2	2002	354	323	2864.07
1985	-114	85	26.44	2003	431	549	4032.51
1986	-70	65	20.72	2004	689	1082	6099.32
1987	3	27	29.23	2005	1324	912	8188.32
1988	-38	53	33.72	2006	2318	453	10663.44
1989	-43	64	55.5	2007	3532	911	15282.49
1990	120	-28	110.93	2008	4206	371	19460.3
1991	133	46	217.12	2009	2433	1945	23991.52
1992	64	-3	194.43	2010	2378	2822	28473.38
1993	-119	235	211.99	2011	1361	2600	31811.48
1994	77	326	516.2	2012	2154	-360	33115.89
1995	16	387	735.97	2013	1482	3430	38213.15
1996	72	400	1050.49	2014	2360	-514	38430.18
1997	370	210	1398.9	2015	3042	-4345	33303.62
1998	315	-63	1449.59	2016	1964	-4170	30105.17
1999	211	52	1546.75				

数据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 <http://www.safe.gov.cn>。

附表 2 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经常项目	金融项目	年份	经常项目	金融项目	年份	经常项目	金融项目
1960	2825	-1805	1989	-99694	47394	1975	18117	-22833
1961	3821	-2833	1990	-86190	58124	1976	4296	-13429
1962	3387	-2262	1991	-2232	43833	1977	-14336	17985
1963	4414	-4053	1992	-50164	93943	1978	-15143	5145
1964	6823	-5917	1993	-85519	79208	1979	-285	-25360
1965	5430	-4974	1994	-122724	124237	1980	2318	-24932
1966	3031	-3660	1995	-113788	82838	1981	5029	-28463
1967	2584	-2378	1996	-124772	134479	1982	-5537	-32825
1968	611	-1049	1997	-140982	218975	1983	-38691	21025
1969	399	1118	1998	-215069	66965	1984	-94344	75673
1970	2331	-2110	1999	-292541	238603	1985	-118155	99480
1971	-1433	11213	2000	-403451	478392	1986	-147176	116602
1972	-5796	7674	2001	-376491	402037	1987	-160655	167805
1973	7140	-4486	2002	-450938	502673	1988	-121153	138261
1974	1961	483	2003	-520565	540586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 <http://www.bea.gov/index.htm>。

注释: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4 年。

(2) 生产要素、产业配套和市场规模共同构成了组合优势。劳动力不仅成本低而且性价比高,具有分阶段的动态成本优势,其竞争力体现为从农民工到承接服务外包和研发国际化的延续;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资源和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中建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体制转轨中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使我国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同时,作为发展中大国,



不仅人口多从而市场规模大,而且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市场快速成长。

(3)新“中心—外围”是南开大学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团队在剖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总结并提出的,曾发表于《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和《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4)实体经济部门包括农业、采矿、公用、建筑、制造、运输仓储、信息产业,虚拟经济部门包括金融、房地产、职业服务等产业,传统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救助、娱乐、休闲、餐饮、批发、零售等产业。

(5)我们讲美国经济的虚拟化主要是从结构角度作出的判断,即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比重大幅降低。然而,从规模角度来看,美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直至2010年,中国制造业才以1.995万亿美元的产值,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占到19.8%,超过美国的19.4%,首次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6)Katz J. F, Krueger A. B. (2016):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 NBER Working Papers.

(7)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求是》2010年第11期。

(8) $n$ 年后本息合计 $10万 + 10万 \times 5\% \times n$ ,  $n$ 年后利差所得为 $10万 \times 15\% \times n$ 。 $10万 + 10万 \times 5\% \times n = 10万 + 15\% \times n$ 。

(9)一般认为美元汇价贬值可以使美国逃债。但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是一国海外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美国的海外资产(即对外债权,如在华FDI)以外币计价,对外债务(如美国国债)以本币计价。美元贬值并不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其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益折算为美元则会增加,因此偿债能力随之增强。在理论上,如果美元贬值足够充分,而美国在华FDI的收益率足够高,我国就会由美国的债权人变为债务人。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和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益为正这两个基本前提下,就不难理解在一些年份虽然其经常项目逆差相当大,但当年外债余额(净国际投资头寸)不增反降了。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10)此时若以人民币结算则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发挥担保的功能作用。

(1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第1版。

(13)近年来,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收入的差距已出现缩小趋势,然而总体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尚未显现。其中的症结就在于财产性(或资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并成为致使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

(14)刘世锦、刘培林、何建武《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15)尹向飞、段文斌《中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16)董林辉、段文斌《技术进步的原因和性质——基于分工和报酬递增的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17)在中国,大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而95%以上的中小企业是非公有制企业。黄孟复《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调查》,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

(1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美元所占份额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已由2000年的71.13%降至2008年的64.12%;同期欧元所占份额则逐年增加,由18.29%升至26.51%;英镑和日元所占份额维持在7.1%—7.5%之间。

(19)刘骏民《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趋势》,《开放导报》2011年第2期。

(20)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和汇率)的最后一步,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

(21)产业走向“中高端”与经济保持“中高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单纯以高端制造业替代低端制造业,从美国的实践就可以发现,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持续下降。因此,走向“中高端”并不一定带来“中高速”,而实体经济占比下降则是必然的。

(22)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第2版。

(责任编辑:马立钊)